

毛泽东读《红楼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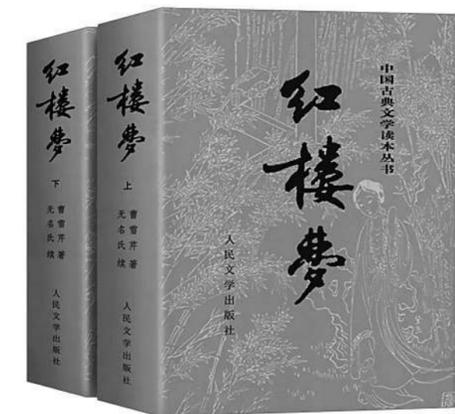
夏海

《红楼梦》是传统社会四大名著之一，达到了明清章回小说的巅峰。毛泽东给予高度评价，认为《红楼梦》在世界文学中也是属于顶级水平，中国“工农业不发达，科学技术水平低，除了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久，以及在文学上有部《红楼梦》等等以外，很多地方不如人家，骄傲不起来”。

《红楼梦》原名《石头记》，是无才补天的顽石在人间的传记，“无才可去补苍天，枉入红尘若许年；此系身前身后事，倩谁记去作奇传”（《第一回》）。顽石幻化为贾宝玉，他不是作者自传，也不是写实人物，而是意象化的小说人物，投射着作者的心灵映像。王国维认为：“《红楼梦》一书与任何喜剧相反，彻头彻尾之悲剧也”（《红楼梦评论》）。表面是写贾宝玉经历的爱情婚姻悲剧，实质反映了贾府由盛而衰的悲剧。作者曹雪芹从贾府兴衰感受到了封建盛世危机，从贾宝玉与林黛玉、薛宝钗的爱情婚姻悲剧，体会到了封建社会无可奈何的衰败趋势。

由于《红楼梦》内容丰富，包罗万象，囊括无遗，内聚着传统社会的物质、制度和精神文化，鲁迅指出，不同的阅读，会有不同的看法，“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绛洞花主小引》）。以蔡元培为代表的索隐派红学，着力探寻真事隐去的究竟，索解出其隐藏的秘密，认为《红楼梦》表面写的是家事，实质影射的是明清尤其是清朝的宫闱史。以胡适为代表的考证派红学，认为《红楼梦》写的是曹雪芹家事，即自康熙至乾隆年间历任清朝江宁织造百余年的曹家家族史。毛泽东别具慧眼，认为《红楼梦》不仅是一部文学作品，更是一部历史教科书，“《红楼梦》可以读，是一部好书。读《红楼梦》不是读故事，而是读历史，这是一部历史小说。”

毛泽东十分喜爱《红楼梦》。据身边工作人员回忆，1964年以后，他至少10次要过不同版本的《红楼梦》，还收藏许多不同的版本，“逝世后，我们整理翻阅他中南海故居（包括在丰泽园住地和后来的游泳池住地）里的全部图书，从中看到，有线装木刻本《红楼



《红楼梦》

梦》，也有线装影印本、石刻本，还有各种平装本，一共有20种之多。”毛泽东不愿意别人说《红楼梦》不好。在井冈山时，有一次贺子珍说她喜欢《水浒传》《三国演义》，不喜欢《红楼梦》，原因在于于是谈情说爱，软绵绵的，没有意思。毛泽东当即予以提醒，“你这个评价不公正，这是一本难得的好书哩！”《红楼梦》专家俞平伯在《红楼梦辨》中写道：“平心看来，《红楼梦》在世界文学中的位置是不很高的。”毛泽东很不满意，在书页上画了两条粗线，又画上大大的问号。

毛泽东对《红楼梦》深有研究。1964年8月，他在北戴河同哲学工作者谈话时说：“《红楼梦》我至少读了五遍……我是把它当历史读的。开始当故事读，后来当历史读。”毛泽东不仅自己反复阅读，而且要求党员干部阅读。1938年10月，在延安召开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期间，毛泽东开玩笑地对贺龙和徐海东两位将军说：“中国有三部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谁不看完这三部小说，谁就不算中国人。”徐海东老实回答没有看过《红楼梦》。毛泽东笑着说：“那，你算半个中国人。”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一而再、再而三地建议党的高级干部阅读《红楼梦》，一两遍不行，至少要读三五遍。毛泽东不仅熟读《红楼

梦》，而且还熟悉红学研究专家的观点，“《红楼梦》写出二百多年到现在还没有搞清楚，可见问题之难。有俞平伯、王昆仑，都是专家。何其芳也写了个序，又出了个吴世昌。这是新红学，老的不算。蔡元培对《红楼梦》的观点是不对的，胡适的看法比较对一点。”

毛泽东有底气评论《红楼梦》，不是因为他的领袖地位，而在于他确有研究。毛泽东的研究深度，是许多红学家所无法比拟的，而他研究的角度，是任何红学家都无法超越的。

毛泽东主要从政治家角度研究评论《红楼梦》，在他看来，《红楼梦》首先是一部描写社会历史的小说。1938年4月，毛泽东在鲁迅艺术学院上的讲话中指出：“《红楼梦》是一部很好的小说，特别是它有极丰富的社会史料。”1961年11月，当一位中央领导谈到自己已看完《红楼梦》，说该书“讲到很细致的封建社会的情况”，毛泽东接着加以发挥，认为《红楼梦》写的是很细致的、很精细的社会历史。1965年，毛泽东还对其表孙女王海容说：“你要不读一点《红楼梦》，你怎么知道什么叫封建社会。”直到晚年，毛泽东仍然思考《红楼梦》的主题，认为“曹雪芹把真事隐去，用假语村言写出来。真事就是政治斗争，不能讲，于是用吊膀子（爱情）去掩盖它”。

毛泽东信奉阶级斗争理论，强调“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作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在毛泽东看来，《红楼梦》是一部描写阶级斗争的小说，“读过一遍没有资格参加议论，你最少要读五遍。这部书不仅是一部文学名著，也是一部形象的阶级斗争史。”具体表现在描写了四大家族，“什么人家都不注意《红楼梦》的第四回，那个总纲，还有《冷子兴演说荣国府》《好了歌》和注。第四回《葫芦僧

乱判葫芦案》，讲护官符，提到四大家族：‘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丰年好大雪（薛），珍珠如土金如铁’。《红楼梦》写四大家族，阶级斗争激烈，几十条人命。”更表现在贾府内部存在着对立的阶级，一个是主人，一个是奴隶，“统治者二十几人（有人算是三十三人），其他都是奴隶，三百多个，鸳鸯、司棋、尤二姐、尤三姐等。讲历史不拿阶级斗争观点讲，就不通。”毛泽东甚至认为，只有懂得阶级斗争，才能读懂《红楼梦》，“多少年来，很多人研究它，并没有真懂。”

曹雪芹生活在康乾盛世，却是一个封建社会开始没落、资本主义已有萌芽的时代，“17世纪是什么时代呢？那是中国的明朝末年和清朝初年。再过一个世纪，到18世纪的上半期，就是清朝乾隆时代，《红楼梦》作者曹雪芹就生活在那个时代，就是产生贾宝玉这种不满意封建制度的小说人物的时代。乾隆时代，中国已经有了一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但是还是封建社会。这就是出现大观园里那一群小说人物的社会背景。”在毛泽东看来，《红楼梦》还是一部描写封建社会衰败的小说，“《红楼梦》里有这样的话：‘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蛛丝儿结满雕梁，绿纱今又在蓬窗上’。这段话说明了在封建社会里，社会关系的兴衰变化，家族的瓦解和崩溃。”中国传统社会组成的细胞是家庭、家族和宗族以及相互之间的血缘纽带关系，儒家将家庭看作是传统社会的根基，“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毛泽东通过《红楼梦》的描写，看到了传统社会根基正在走向消解和崩溃。

客观地说，在无产阶级革命领袖中，把文学作品当作历史来读，并不是毛泽东的首创。恩格斯认为，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里给我们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致玛·哈克奈斯》）。列宁把托尔斯泰的作品当作历史来读，称他是“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然而，像毛泽东那样，一生钟情《红楼梦》，反复阅读《红楼梦》，深入研究《红楼梦》，经常运用《红楼梦》来指导工作，助力革命和建设实践，可谓是一无二、绝无仅有的存在。

冯骥才：为保护传承中华优秀文化作出更大贡献

“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目前已经取得一系列阶段性成果，这是中华民族无与伦比的文学创造、是中华文明的历史见证、是民族宝贵的文化财富，也是文化传承发展的强大资源与根基。”8月21日，由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主办的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系列新成果发布会暨成果展览上，著名学者、中国民间协名誉主席冯骥才通过视频这样讲道。

“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是2017年1月24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中十五个重点项目之一。2021年4月，该工程列入中宣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十四五”重点项目规划》。2022年8月，该工程列入中办、国办《“十四五”文化发展规划》，被确定为“促进乡村文化建设”民间文艺传承项目。

本次发布会同时举办成果

展，聚焦该工程取得的一系列最新成果，以坚持民间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为主线，以“新时代·新征程·新成果·新起点”为主题，以《中国民间文学大系》书库出版62卷图书、社会宣传推广活动、基础资料数据库应用平台展示体验等为主要内容，展示该工程实施以来对民间文学进行的大规模数据采集信息及文本资料整理、编纂出版、研究利用、社会推广的新经验与新成果，以期及时总结成功经验、推动工作进展，坚持自信自强、守正创新，不断扩大大系出版工程社会影响、取得更大社会效益，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及民间文艺的当代传承传播。

冯骥才作为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领导小组副组长、学术委员会主任，他认为，在这项工作的积极推动中，民间文学的传承和传播热已经出现，田野考察与研究已成为学术热点，我们有责任担当的民间文艺工作者的队伍正在渐渐壮大，希望全国各地各民族民间文艺工作者再接再厉，为保护传承中华优秀文化作出更大的贡献。（杨雪）

阿来：行走的力量

近日，行走的力量——阿来新作《西高地行记》新书发布会在成都阿来书房举办。《西高地行记》是全国政协委员、著名作家阿来的最新作品，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

阿来曾说，行走与写作是他的宿命，于是有了这部行走笔记。从四川到西藏、云南、贵州、甘肃……阿来写大地、星光、山口、银环蛇、野人、鱼、马、群山和声音，完全去除了多余的神秘，但又不忘把读者引向广阔的精神空间。同时，作为一位植物学的痴迷者和博学者，阿来在所有文章中无一不聚焦花草树木。他说：“我是一个爱植物的人。爱植物，自然会更爱它们开放的花朵。”在《西高地行记》中，每到一处，都会有繁花盛放。

“我走向了宽广的大地，走向了绵延的群山，走向了无边的

草原。那时我就下定了决心，不管是在文学之中，还是文学之外，我都将尽力使自己的生命与一个更伟大的存在对接起来。”谈及行走的意义，阿来表示，行走让我们认识世界、深入世界，这样人生才可能走向开阔，写作才可能变得精致又广阔。

“《西高地行记》的每一篇文章都有三个向度，分别对应地质学、文化学、生物学（包括植物学）的知识储备。有了这三个向度，文章就变得立体起来。我们在大地上行走，首先需要下功夫了解它的地理史、文化史，知道这些生命体的名字，才能书写这片大地、获得个人和社会的生命体验。”阿来认为，写作者要给读者提供新知识和掌握新知识的方法，从更高的层面来说，要通过不同生命体的认知态度，为读者呈现世界观和体认世界的路径。（谢颖）

诗仙与诗佛

张炜



仅仅从记载上看，李白和王维这两个大诗人好像没有见过面。他们年龄差不多，诗名都很大。这两个人一个被称为“诗仙”，一个被称为“诗佛”，多么相近，却没有那么诗文切磋和交往的文字留下来，让今天的人觉得奇怪而遗憾。这里面的原因很多，如今已经不能猜度。比如即便是当代文人，哪怕两人时常见面，但由于各种原因没有留下交往的记录，也是有可能的——很久之后，人们也就不知道他们曾经在一起了。所以说文字记载只是一个方面，没有，也并不能说明二者没有见过面。

但是我们又真的没有他们在一起的明证。唐代那个时期的有名诗人很多，可是好像都不太扎堆，这与今天的情形是大为不同的。一方面可能是交通不便，信息不便，所以要见一次真是很难。李白和杜甫一生从记载上看只有三

次，但实际上几次就不得而知了。我们从留下的文字看，好像张九龄与李白也没有见面，但是李白写庐山瀑布的那首诗好像明显受到了张九龄的影响，这说明李白起码对张九龄的诗是十分熟悉的。杜甫有关于张九龄的回忆，但他们在在一起的描述也不多见。李白与杜甫、孟浩然、李邕、贺知章、高适、王昌龄、岑参等在一起的文字记述是清楚的，但涉及更多的反而是其他一些人，如官场人物和道士们。特别是后一种，李白和杜甫都是相当喜欢的。

王昌龄与李白、杜甫、高适、孟浩然、王之涣、岑参等人都是交情很深的的朋友，但这些人之间的却极可能一生未曾识见。李白写道：“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但记载中他和孟浩然在一起的时间也很短。杜甫怀念李白的诗很多，可是记录中他们在一起的时间并不算很长。还有写《春江花月夜》的张若虚，一般认为

他出生在初唐和盛唐之交，与以上的诗人更难有什么交集。留在《全唐诗》中的那个时期的诗人，只有很少一部分是彼此提到过的。这就是那个时代的隔膜与寂寞，在今天看有一种令人神往的荒凉感。

有人认为王维与李白的个人身世差异太大，这也许是他们未能成为朋友的原因。王维比起李杜二人幸运得多，十几岁即有诗名，二十一岁得中进士。在诗歌和绘画两个方面王维的成就都是很大的，甚至在音乐方面也有很高的造诣。后来的大诗人苏轼评价说：“味摩诘（王维）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王维是盛唐诗人的代表，留下的诗篇有400多首，也算是很多的了。与李白不同的是，王维精通佛学，受禅宗影响很大。佛教有一部《维摩诘经》，就是王维名和字的由来。人们习惯上将他与孟浩然合称“王孟”。

王维官运较畅，做过监察御史、凉州河西节度幕判官，还有过半官半隐的一段生活：买下了初唐宫廷诗人宋之问蓝田山麓的别墅，修养身心。《王右丞集注》中的《大荐福寺大德道光禅师塔铭》曾这样记载王维：“日饭十数名僧，以玄谈为乐，斋中无所有，惟茶铛药臼，经案绳床而已。退朝之后，焚香独坐，以禅诵为事。”

看来王维对于佛事的痴迷，丝毫不亚于李白对道家的深情，而且他们的诗歌写作显然都深深得益于这一切。可以设想王维的“茶铛药臼”就像李白迷恋丹炉，但他们的信仰取向又有佛道之别，这可能也是两位大诗人终生不交的原因之一——不过真实的原因也许远没有那样复杂，而是非常简单：仅仅由于性格差异，一个人就可以不喜欢另一个人。

李白和杜甫的信仰取向又有佛道之别，这可能也是两位大诗人终生不交的原因之一——不过真实的原因也许远没有那样复杂，而是非常简单：仅仅由于性格差异，一个人就可以不喜欢另一个人。

李白的“道”、王维的“佛”，这种选择与不同的生命质地有关。李白也并不是从信仰的意义上选择了道，他同时也是信佛的，与儒释道三方面的关系都很大。唐朝虽然也有反佛的时期，但更有崇佛的阶段，尤其是李白生活的天元天宝年间，更

是三教并存的时期。佛教在东晋时期就盛行并影响了文坛，到唐朝则得到了巨大发展，李白置身其中，一定会受到影响——他自称“青莲居士”，与僧人酬答的诗也很多。李白有一首《答湖州迦叶司马问白是何人》：“青莲居士谪仙人，酒肆藏名三十春。湖州司马何须问，金粟如来是后身。”湖州司马对李白的信仰定位是有疑问的，所以才会问他到底是佛还是道？而李白回答：“如果我再转世的话，就是金粟如来了。”可见道与佛在他看来并不是那么界限分明。李白还写过一篇很长的佛教颂文，《崇国寺佛顶尊胜陀罗尼幢颂并序》，洋洋洒洒，气势磅礴，从中可以看出对佛教典故制度的熟悉程度，看出对佛法威力的敬仰。

可以肯定的是，李白对王维所知甚多，因为当时王维的名气太大了，不仅是官方地位诗坛地位，还有佛界地位——从“金粟如来是后身”一句可以看出，他对王维还是蛮敬重的，“金粟如来”是印度大乘佛教居士维摩诘的号，王维之名号即来源于此。李白此处提及，不能不联想到当朝诗人王维。

这样两个才华横溢并且性情切近的人物，如果有些交往，再展开诗文切磋，该是多么有意义和有趣的事情，可惜全然不见这一类记载。

（作者系著名作家，中国作协副主席）

赵聪：传播推广民族音乐新探索

中央民族乐团“中国民歌地图”合唱音乐会日前在北京国家大剧院成功举办，为观众奉献了一场具有民族文化魅力的演出。

在文化和旅游部公共服务司、艺术司的统筹指导下，中央民族乐团与文化和旅游部全国公共文化发展中心于2021年4月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合力共建中国民族音乐普及推广中心。中央民族乐团以演出、采风、调研、大师班、培训等多种形式，助力把更多优秀的地方民族音乐从地方带到更广阔的舞台上。此次音乐会与大凉山州的合作正是中央民族乐团这一初心的体现。音乐会上半场一首《白月亮》，四位身穿白族服饰的云南大理州白剧团的演员首次登上国家大剧院舞台。

不久前，全国政协委员、中央民族乐团团长赵聪带领团队赴云南大理白剧团考察调研，主创

人员两次赴云南大理采风。《白月光》就是把白剧曲目《白月亮白姐姐》的旋律进行了一定的改编和调整，并融合了当地曲目《西山调》的部分旋律，加入白族说唱艺术，以及比较具有时代特色的乐器手碟，创编成既符合时代审美又极具当地特色的作品。

赵聪说，《白月亮》的诞生既是乐团将考察调研与舞台实践相结合的成功探索，更是对“艺术源自人民”的深刻践行，希望将更多深藏于民间沃土的音乐带到更高、更广的舞台，为传播推广民族音乐作出应有贡献。赵聪表示，近年来，中央民族乐团从理论深度、艺术高度和实践广度三个维度，不断探索“民歌合唱”新时期的全新探索路径和轨道，并希望为“民歌合唱”的普及推广贡献力量，这场“中国民歌地图”正是这些探索实践的成果展现。（张丽）

谷好好：一场戏曲溯源之约 一次文化交流之旅

日前，“戏从温州来”2023南戏经典文化周（上海站）系列启动。在专家研讨会上，全国政协委员、上海民乐团团长、上海戏剧家协会主席谷好好表示，百戏之祖是南戏，南戏故里在温州。从《张协状元》到四大南戏，从数百座散落在民间的古戏台到现代化都市的大舞台，无论时空如何变迁，温州总有着看不厌的戏，说不完的故事。当历史和时代际会，当传承与创新融合，古老的戏曲在时代精神上焕发新的生机，在现实舞台上唱响中国声音，向世人展示优秀传统文化欣欣盛世、百花竞放的繁荣图景。

在谷好好的印象中，温州南戏像这样以整体的姿态在上海吹响集结号，应该是历史上的首次。这不仅反映了保护、继承、发展传统文化在温州已经结出了

丰硕的成果，而且反映了上海温州两地深厚的文脉关联。上海、温州，可以说是吴越文化和瓯越文化两种地域文化的代表城市。这次文化周为两座城市续接文脉、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了绝佳的契机。

谷好好说，在全国文化界都在深入推进溯源工程、增进文化自信的大背景下，南戏故里——温州带着这四场演出来到上海的舞台上，本身就具有非常深刻的意义。溯源工程核心就是要回答“中华文明从何而来”这一重大命题。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戏曲艺术无疑对于回答这一命题提供了丰富内涵。厘清戏曲艺术的发展脉络，南戏必定是其中不可缺少的重点篇章。所以从这个意义上看，南戏之于溯源工程，之于文化自信，有着太多的工作值得我们深入挖掘，精雕细琢。（郭海凌）